从社会批判到人性自省：戏剧《光辉使者》对经典白蛇叙事的悲剧重构

王焱 王怀砚

摘要：先锋戏剧《光辉使者》对经典白蛇叙事进行了现代化悲剧重构，打破了田汉版本确立的、以情爱自由对抗封建礼法的叙事范式，将悲剧归因于人性困境，实现了从社会批判到人性自省的价值转向。该剧对白蛇传说经典人物体系进行颠覆性重塑，将白素贞重构为因善意失度、执念膨胀而酿成灾殃的理想主义者白斐儿，同时赋予许仙、小青、法海全新的人物形象和人格内涵。该剧剔除传统情爱主线，围绕善意边界、力量限度、秩序平衡构建叙事内核，叩问“有善意与力量的人何以自我沉沦”，并综合运用歌唱咏叹、特色器乐配置等手段铺展心理流变。该剧保留经典情节，化用西方神性堕落母题，并完成本土化、去宗教化改造。该剧的创新实践，为传统民间文学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范式。

关键词：《光辉使者》；张广天；《白蛇传》；经典重构；悲剧

From Social Critique to Introspection on Human Nature: The Tragic Reconstruction of the Classic White Snake Narrative in the Play *The Envoy of Glory*

Wang Yan, Wang Huaiyan

Abstract: The avant-garde play *The Envoy of Glory* undertakes a modern tragic reconstruction of the classic White Snake narrative, breaking the narrative paradigm established by Tian Han’s version—that of resisting feudal ethics through the freedom of love—and attributing the tragedy to the predicament of human nature, thereby achieving a value shift from social critique to introspection on human nature. The play carries out a subversive reshaping of the classic character system of the White Snake legend, reconstructing Bai Suzhen as Bai Fei’er, an idealist who brings about disaster through excessive goodwill and inflated obsession, while endowing Xu Xian, Xiao Qing, and Fa Hai with entirely new character images and personality connotations. The play removes the traditional love storyline and builds its narrative core around the boundaries of goodwill, the limits of power, and the balance of order, asking “how can a person with goodwill and power bring about their own downfall,” while comprehensively employing means such as song and aria and distinctive instrumental arrangements to unfold psychological fluctuations. The play retains classic plot elements, adapts the Western motif of divine fall, and completes a localized, de-religionized transformation. Its innovative practice provides a paradigm for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folk literature.

Keywords: *The Envoy of Glory*; Zhang Guangtian; *Th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classic reconstruction; tragedy

引言

《白蛇传》不仅是流传久远的民间传说，也是当代文化场域中传播最广、群众基础极为深厚的经典 IP 之一，历经近千年的民间口头流传、文人整理润色、舞台戏曲演绎与现代影视重构，逐步沉淀出能够适配不同时代社会思潮与审美取向的文本谱系。正如周宪所言，“经典本身是一种历史产物，因此把经典视为永恒不变的权威和标准显然不合时宜。”[①] 经典的生命力恰恰体现于不断被重新阐释和建构的开放性之中。

纵观白蛇叙事的流变历程，可以梳理出几个关键历史节点。宋代《西湖三塔记》为白蛇故事确立了叙事雏形，塑造出惑人害命的妖异蛇女形象，整体秉持传统志怪的警世基调，并无双向爱慕的爱情叙事，蛇妖尚不具备人性化特质，属于白蛇传说的萌芽形态。明代冯梦龙《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突破了早期纯粹妖魔化的叙事范式，塑造出兼具妖性偏执与世俗情爱执念的白娘子形象，构建起人妖相恋、佛法镇妖的故事框架。清代方成培《雷峰塔传奇》整合新增白娘子产子、子嗣登科、祭塔团圆等情节，消解了原生文本的妖邪属性，将白娘子重塑为忠贞隐忍、有情有义的传统女性形象，确立了大团圆叙事模板，完成了白蛇故事的温情化转型。

真正赋予白蛇叙事现代精神内核的是 1953 年田汉的改编本，该版本确立白蛇追求爱情自由、反抗封建压迫的现代主题，白素贞被正式塑造为争取爱情与自由的正面女性典范，成为现当代戏曲、文学改编的权威蓝本；1992 年热播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接续田汉版本的正向人物内核，弱化社会批判色彩，进一步放大并固化了国民关于白蛇的美好集体记忆。由于田汉版本奠定了白蛇叙事的现代性基调，因此，本文讨论的改编创新，主要以田汉版本作为《光辉使者》对话、解构与突破的经典基底。

先锋戏剧导演张广天一贯以思辨人性、嫁接多元文化资源为创作特色。其 2026 年新作《光辉使者》以白蛇经典情节为外壳，凭借新颖的改编逻辑与深刻的内涵，成为传统民间母题先锋化改编的典型范本。不同于传统白蛇传说“妖仙报恩、情爱纠葛”的经典叙事，《光辉使者》完成了对民间母题的颠覆性重构。该剧打破白蛇为妖的固有设定，将核心主角重塑为下凡救赎的天使拉斐尔，她化身人间女子白斐儿，与天界守门人青嫄一同降临人间，核心使命是救赎深陷苦难、灵魂软弱的凡间药铺伙计戴逸轩。该剧摒弃传统情爱叙事主线，讲述天使怀揣济世救人的初心奔赴人间，却因天界理想与俗世现实的认知错位，历经劫难的悲剧性故事，以跨文化叙事重构了经典传说的当代精神内核。

该剧于 2026 年 8 月 20 日在广州南湖南艺术家夏宫首演，首演十场，观众好评不断，口碑持续发酵，现已两轮加演 20 场。该剧引起文学、戏剧界人士关注。丰盛指出：“《光辉使者》以新潮、时尚的舞台表达，打造了一部‘活着的白蛇传’，让传统题材在当代舞台上迸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因此，对《光辉使者》的理解不能仅仅以‘天使版白蛇传’的创意为落脚点，而应视作一种可复制的当代舞台方法论样式，并将其延伸至众多遭遇当代叙事困境的文艺作品中去，解决语言转换的难题。”[②] 吴凤斯指出：“它验证了‘舞台本身就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以‘假定性’为前提的

① 周宪：《经典的编码和解码》，《文学评论》2012 年第 4 期，第 93 页。

② 丰盛：《光辉使者》掀起观剧高潮｜一轮结束又迎来二轮高峰，北青网，2026-09-07，[2026-09-09]. https://culture.ynet.com/2026/09/07/4041218t467.html。

表演艺术允许演员用心创造出来的形色各异的人物，东方的、西方的，传统的、当代的，只要思想性是合乎情理的，艺术审美是值得考究的，那么外在的形式可以多元多样。”[①] 业内普遍肯定张广天以多学科方法论改造民间经典，开辟了一种契合当代语境、兼具学术深度与审美新意的戏剧范式。本文通过多维对比经典文本与该剧的核心差异，系统阐释其艺术创新与思想价值，为传统民间传说的现代化转型提供理论参考。

一、叙事重构：由外部伦理冲突转向内在人性困境

经典文本当代改编的成功范本，本质是对传统叙事范式、冲突逻辑与价值内核的创造性重构，并非简单的内容增补与情节修缮。赵建新在区分传统“整理改编”与当代“经典改写”时指出，后者不再满足于对经典剧目的丰富和补充，而是在叙事方式、戏剧情节和人物形象等层面进行重新建构，甚至颠覆既有人物形象，从而打开传统文本中原本未被关注的阐释空间。[②] 这一当代改写的创作特质，精准契合《光辉使者》的创作理念，也是其区别于同质化白蛇改编作品的重要特征。

1. 叙事归因转换：从外部礼法压迫到内在善意越界

田汉定型的现代白蛇叙事范式，最主要的特质就是悲剧冲突的外化、悲剧责任的他者化，适配新中国成立初期反封建、求解放的时代思想浪潮。田汉为贴合时代主题，对传统人物与剧情进行高度意识形态化的重塑。姚斯青指出，在田汉改编时驱逐了“白蛇传”旧故事中掺杂的“恩义”“孝道”等旧伦理，同时构筑出高度纯粹化的自由恋爱与反压迫之彻底性之间的联系。[③] 田汉在《<白蛇传>序》中援引周扬的观点，认为白娘子等民间传说人物表现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妇女“追求自由和幸福的不可征服的意志”。[④] 在这套叙事体系中，白素贞一生行善积德、体恤百姓、忠于情爱，乃善良忠贞、勇敢追求自由与幸福的美的化身。法海作为封建礼教体系的化身，代表着保守冷酷的世俗权威，刻意干预凡人情爱、打压人性美好、拆散和睦家庭，是整部悲剧的作恶源头。

经典桥段“水漫金山”也被重构价值内核，从原始剧本中偏执祸世的负面行为，转化为弱者绝境求生、反抗强权压迫、捍卫情爱尊严的正义抗争。整体叙事形成逻辑闭环：善良的个体在封建桎梏下无路可退，最终酿成悲剧，悲剧根源归于外部社会制度的结构性弊病，悲剧主体无需承担主观责任。

与经典版本相比，《光辉使者》的创新则表现在它实现悲剧归因的内向迁移，消解了传统叙事的外部冲突体系。张广天在谈及创作动机时指出：“天使一心想救俗世苦难的人，却因此造成灾殃。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不是反思情感的悲剧，而是反思历史的悲剧。”[⑤] 这揭示了《光辉使者》悲剧性的重要变化：它剥离了礼教压迫等外部桎梏，构建人性叙事空间，悲剧源于主体的人性缺陷与认知偏差，而不再只是外部强权。

剧中女主白娄儿以光明使者的神性身份下凡，初以济世安民为使命。直至与凡人戴逸轩相恋，

① 吴凤思：剧评丨张广天为什么要把“白蛇传”改编为“天使的故事”，2026-08-24，［2026-09-09］.https://m.mp.oeeee.com/a/BAAFRD0000202608241650650.html。

② 赵建新：从“整理改编”到“经典改写”——兼论现代戏曲的一种新文体，《戏剧艺术》2024 年第 5 期，第 73—75 页。

③ 姚斯青：《十年旧铁铸新剑：田汉对“白蛇传”改编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 年第 5 期，第 49—60 页。

④ 田汉、陈刚：《田汉全集》第 17 卷·文论，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 年，第 351—352 页。

⑤ 李行、李嫣然：天使版白蛇传？新型古装戏多个场次已售罄，2026-08-24，［2026-09-10］.https://static.nfnews.com/content/202608/24/c12750339.html。

私人情感逐步侵蚀其宏大理想，使其行为逻辑逐渐异化。剧中白斐儿起初要拯救苍生，但随着欲念的浸染，逐步滋生出极端化的救世执念，把伤害包装成救赎。她曾盗取私藏官银，并为此振振有词地自我辩护：在她眼中当世官场腐朽，为官者大多贪婪不堪，现存制度已经丧失公正，自己偷盗官银，正是替普通百姓伸张公道，以自己的方式塑造人间公平。为保障戴逸轩药铺能够生意兴隆，她竟向城中河水投放慢性毒物，致使城内民众染上肠胃疾患。在白斐儿的自我叙事里，人为制造病痛之后再施以药物救治，既可以扶持爱人的生计，又能够借行医的机会救济受苦百姓，这份济世护人的初衷，足以掩盖投毒害人这一恶劣手段。

洪水浩劫的颠覆性改写，是《光辉使者》区别于传统白蛇叙事的标志性情节。在经典范式中，水漫金山是白素贞被极致压迫、走投无路后的被动反抗，是弱者对抗强权的悲壮抗争，具备道德正义性与情感合理性，是大众共情的重要情节。而在《光辉使者》的叙事体系中，这一经典情节褪去正义色彩。洪水浩劫是白斐儿私欲彻底失控后的极端宣泄，是人性缺陷催生的人为灾祸。她动用滔天神力，将自我执念凌驾于万千苍生的安危之上。这场洪水不再是反抗强权的正义壮举，而是偏执自我引发的人间浩劫，完成了对经典白蛇叙事核心情节的颠覆性解构。转化为主体执念失控的恶果。

青嫄作为有清醒认知的旁观者，她屡次规劝白斐儿：世事参差、起落更迭，本就是天地运行的固有规律。世人若执意以私意强行干涉天道，终将打破天地平衡，致使秩序倾颓、生灵遭劫。但白斐儿长期陷入理想主义者典型的自我蒙蔽困境，笃定救世目标正义，故可以豁免一切越界行为。她无节制滥用神性力量，一次次的善意越界不断累积隐患、叠加失衡，最终导致神力失控、洪水肆虐山河、生灵涂炭。整部悲剧并无外力压迫，是主体执念膨胀、自我美化、拒绝自省导致的人性灾难。

2. 叙事母题转变：情爱从正面主线降为悲剧催化剂

在白蛇经典叙事中，始终是贯穿全篇的主线，所有情节架构、人物行动、冲突设置与主题表达均依附于男女主的情爱纠葛。《光辉使者》保留经典情节外壳，置换叙事内核，完成母题的根本性迁移。白斐儿初始的人生使命是治愈苍生，剧中情爱从叙事主线降级为附属支线，是白斐儿济世生涯中的偶然羁绊，而非人生追求的最终目标。

更为关键的是，本剧改变了情爱母题的正向价值属性，将原本歌颂忠贞、承载美好、推动抗争的情爱线索，转化为束缚宏大理想、滋生私人执念、催生悲剧浩劫的催化剂。在传统版本中，情爱都是人物坚守、抗争、成长的正向动力，是故事歌颂的价值内核。而在《光辉使者》中，世俗情爱成为白斐儿人生格局收缩、理想初心偏移、公私认知混淆的关键转折点。遇见戴逸轩之前，白斐儿以普度万民为毕生追求；陷入世俗情爱之后，从心怀万民的神性使者，逐步堕落为徇私的世俗个体。她下意识将守护私人情爱、保全爱人安宁，等同于履行济世渡人的崇高使命，刻意模糊公私边界，混淆理想与私情，美化越界行为。私情滋生的狭隘与偏执，让她无视青嫄的反复劝谏、漠视天地秩序的规律，一步步从光明济世的神圣使者，沦为祸害苍生的灾难制造者。该剧将传统的情爱歌颂主线剥离，将叙事重心转向人性自省，重构了情爱母题的价值属性。

3. 叙事节奏转型：从外化冲突演绎到内在心理铺展

经典白蛇叙事遵循通俗文艺创作逻辑，依靠

密集的外部矛盾推动故事发展，以紧凑的剧情节奏、高频的戏剧爆点承载戏剧效果。田汉版戏曲为强化舞台观赏性，着力渲染正邪对峙、天人斗法、生死抗争等激烈场面，重视情节的跌宕演绎，对人物幽微的内心世界着墨有限。

《光辉使者》则打破这套依赖外部冲突制造高潮的通俗叙事模式，将叙事重心转移到人物内在的心理流变与人性拉扯之上。丰盛这样描述该剧的叙事表达方式：“ LED 屏的影像过渡、演员的开放式换装、布景道具的现场搬移、音乐旋律的节奏衔接等诸多手段被有机整合，共同编织出这部戏独特的叙事肌理，使得舞台空间从写实、再现的负担中解放出来，为剧情的推进与演员的表演释放出更大的想象余地，以至于观众在距离中获得更为清醒的凝视，重新抵达戏剧的神圣性。”[①] 剧中由音乐家武玮创作的七首艺术歌曲，由歌者以美声唱法演绎，构成一条独立的叙事线索，是哲理咏叹的具象化表达。源自西方的钢琴在剧中承担文场功能，架子鼓则担当武场功能。

该剧充分调动先锋戏剧的舞台表现手段，大量运用内心独白、音乐咏叹等形式，不再依靠激烈的打斗、对峙制造冲突，转而把潜藏在人物意识深处的欲望、挣扎与自我辩护直接呈现在舞台。白蒯儿大段的独白是心理过程的可视化呈现，它并不局限于抒发儿女情爱，更多是理想主义者面向自我的申辩，不断为其越界行为寻找合理性。

由于戏剧冲突被收束于人物的精神世界，整部作品也由此形成一种内敛、渐进的叙事节奏。在这种叙事处理之下，主要人物的心态转变，并不依靠突发的戏剧性事件完成，而是在层层递进的心理展演中缓缓铺陈：白蒯儿从初心纯粹的光明使者逐步滑向执念异化；戴逸轩从温和安于现状走向麻木纵容；青嫒从满怀期许地反复劝谏陷入无力改变现实的悲壮绝望。人物的转变不是某一次突发事件促成，而是一次次选择不断叠加、人性边界持续失守之后的必然结果。

外在戏剧冲突被有意弱化，人物精神内部的矛盾拉扯上升为戏剧真正的战场。这种内敛深沉的叙事节奏，跳出通俗文艺的情绪宣泄与感官刺激，把观众的注意力从“ 发生了什么事 ”引向“ 人物何以变成这样 ”，强化文本的思辨厚度，让作品完成从通俗叙事文本向人性自省的先锋思辨文本的转向，具备了崭新的现代戏剧美学价值与思想价值。

二、原型的嬗变：白蛇经典人物的当代拓展

在经典文本之中，人物塑造服务于特定时期的社会表达，人物的价值立场与性格特质围绕外部伦理冲突展开，由此形成适配时代语境的人物范式。《光辉使者》重新勘探人性内部的欲望、执念与认知局限，推动原有经典人物原型发生内涵转向，在新旧形象的差异之中生发出新的思辨向度。

1. 白蒯儿：从反抗礼教的情爱抗争者到被执念裹挟的理想主义者

在田汉所确立的现代经典叙事范式当中，白素贞的形象建构紧密绑定反封建的时代主题。她行善济世、忠贞坚韧，所承受的苦难主要来自外部强权的压迫，人物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反抗礼教束缚、追求情爱自由，成为承载时代人文理想的艺术形象，契合彼时社会对女性解放、个体自由的价值呼唤。

而《光辉使者》则重塑人物内核，将白蒯儿塑造为被执念裹挟的理想主义者。白蒯儿以光明

① 丰盛：《光辉使者》掀起观剧高潮丨一轮结束又迎来二轮高峰，2026-09-07，［2026-09-09］. https://culture.ynet.com/2026/09/07/4041218t467.html。

使者的身份下凡，怀揣济世渡人的初心。而世俗情爱介入之后，个体情感逐步侵蚀公共使命，崇高理想慢慢滋生偏执倾向，使她陷入“目的正义便可豁免手段”的认知盲区。她并无主动作恶的主观意图，却出现“善意造恶、理想反噬”的悲剧走向。她凭借自身强大的神性力量，试图抹平世间缺憾，在自我合理化的心理驱动下不断突破秩序边界，最终酿成洪水浩劫。白娄儿的悲剧不再来自外界的压迫伤害，更多源于主体自身的认知蒙蔽与执念膨胀。这一形象变化，把探讨的重心从个体反抗外部不公，转向对善意限度、力量边界的反思，为这一古老人物原型增添理想主义困境的现代隐喻。

2. 戴逸轩：从伦理夹缝中的情义凡人到回避责任的依附型人格

传统版本的许仙作为世俗凡人的代表，性格存在软弱犹豫的面向，同时保有凡人的善良与情义，人物的戏剧张力集中体现在礼教规训与夫妻情爱之间的拉扯纠结，呈现出普通凡人在时代伦理夹缝中的真实处境。

《光辉使者》保留许仙凡人的身份定位，改写人物的内在精神状态，将戴逸轩塑造为依附性人格的代表。他性情温和，并无大奸大恶，却缺少独立判断与担当意识，心安理得享受白娄儿神性力量带来的安稳富足，对其不断干预天道秩序的行为选择沉默回避、消极纵容。即便目睹白娄儿遭受调戏屈辱，他依旧优先权衡现实利弊，放弃维护伴侣。对他而言，亲密关系更多等同于一份安稳世俗生活的保障。戴逸轩的形象变化，不再聚焦凡人在伦理夹缝的两难抉择，转而指向当代语境下“依附享乐、回避责任、旁观纵容”的人格现象，借由这一人物叩问旁观者的责任问题，生成新的现实反思维度。

3. 青嫒：从情爱主线的辅佐伙伴到坚守秩序的悲剧先知

在以往白蛇叙事脉络里，小青的人物行动大多围绕女主的情爱命运展开，作为重要的辅助角色，陪伴、辅佐白素贞，是故事当中忠义果敢的伙伴形象，服务于人妖相恋的主线叙事。

《光辉使者》保留青嫒与白娄儿的同伴关系，拓展人物的思想格局与叙事权重，重塑其精神内核。剧中的青嫒拥有独立完整的价值判断，能够洞察到过度动用神性力量会造成天地失衡，多次向白娄儿发出劝谏，警示肆意干涉世间秩序的巨大风险。可她的理性声音难以撼动深陷执念的白娄儿，无力阻止灾难降临。浩劫发生之后，本可以独善其身的青嫒，选择以殉道的方式，祭奠苍生、弥补秩序的损伤。相较于传统白蛇叙事中辅佐女主的配角形象，青嫒跳出了功能性辅助的定位，被赋予了独立的精神立场与悲剧担当，成为剧中敬畏天道秩序、坚守自我自省的精神载体。

4. 瑜罕难：从偏执反派到审慎中立的秩序守护者

田汉版《白蛇传》将法海塑造成封建礼教权威的具象象征，压抑真情，拆散眷属，承担着故事对立冲突的叙事功能，是服务于反封建叙事主题的经典反面艺术形象。

《光辉使者》的瑜罕难一改固化的冷酷反派、礼教暴君的法海人设，重构为审慎中立、理性克制、敬畏秩序、守护苍生的秩序守护者。瑜罕难不会主动干预人间情爱与世俗生活，仅在白娄儿持续越界、天地秩序濒临崩塌之际，才被动出手制衡。这一改写将人物从主动迫害的对立反派，重塑为被动兜底的秩序制衡者，促使观众重新审视规则秩序与个体自由的辩证关系。

瑜罕难并不自诩代表绝对正义，他承认现世秩序本身充满缺憾，却认定这份并不完满的秩序

仍是万物存续的根基，不能以消弭缺憾为借口，动用至高力量肆意改写世间运行法则。这一认知暗合《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即便手握足以左右苍生祸福的力量，也应当敬畏天道本然节律，不可拿主观理想强行剪裁现实。

瑜罕难与白斐儿由此形成极具思辨价值的镜像：二者皆具备干预世间命运的强大力量，白斐儿怀抱济世愿景，却无法洞悉秩序的奥义，最终酿成浩劫；瑜罕难同样掌握制衡力量，却始终克制自身介入欲求，只在体系崩毁的临界点才采取行动。剧本通过这组人物对照提出一个深刻命题：当人拥有超凡的力量时，主体的自省、敬畏与边界意识，才是维系世间安稳的关键。

三、悲剧革新：从社会伦理悲剧到人性自省悲剧

1. 悲剧主体：从被动受难到主动越界

传统白蛇悲剧的美学内质，是无辜主体的被动受难，感染力源于弱者遭受强权压迫的悲情特质。经典范式中，白素贞的苦难主要为外界强加。观众的审美体验以怜悯、愤慨为主，悲剧价值聚焦于共情弱者、批判外部强权。

《光辉使者》实现了悲剧主体属性的翻转，将被动受难者重构为主动造局者。剧中的秩序崩塌、苍生受难，是白斐儿自主选择、持续越界、执念膨胀、拒绝自省的必然结果，而非外力压迫所致。这一革新让该剧的悲剧美学从外部衍生悲情，转向内部人性反思，完成了悲剧主体的美学转换。

2. 悲剧内核：从社会伦理批判到人性边界思辨

田汉版本的悲剧内核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落脚于反封建的社会制度批判，通过情爱被摧毁、善人受迫害的叙事，揭露封建礼教压抑人性、扼杀真情的弊病，冲突核心是两套伦理体系的对立，反思维度始终向外，服务于特定时代的社会思潮。

《光辉使者》进一步弱化了传统白蛇叙事中的礼教对立与正邪冲突，将问题意识引向更具普世性的人性反思。王朝旭认为，这一改编使白蛇故事转化为“一场关于存在、拯救与人性的深刻叩问”[①]。质言之，作品所关注的已经不仅是爱情能否突破外部禁忌，更包括善意是否天然正当、强大力量如何确定自身边界，以及主体能否意识到自身理想主义的限度。作品也不再局限于讨论礼教对错、制度弊病、正邪对立、命运不公等时代命题，而是聚焦人类普世的命题：节制、自省、敬畏、守度是一切崇高力量与美好理想的底线。崇高的善意如若失去节制、纯粹的理想如若丧失自省、强大的力量如若缺失边界，终将自我异化、酿成灾难。本剧将悲剧的根源，从外部时代环境的压迫，归根于人性的幽暗、局限与偏执，从而具备了适配现代社会、映照当代人性的思辨价值。

3. 悲剧价值：从情绪共情到哲理反思

传统白蛇叙事的悲剧审美，通过塑造善恶分明的人物与不公的外部环境，引导观众产生同情、惋惜、愤慨的情绪，完成善恶评判与道德宣教，并未导向深层的自我审视。

中国传统悲剧往往趋向道德教化式的闭环，即便经历深重苦难，最终仍倾向善恶有报的圆满收场，以慰藉观众的情感期待。而《光辉使者》摒弃了这套补偿式叙事逻辑，悲剧的落点不再是外部苦难得到清算，而是停留在人的精神困境本身。观众得不到情绪宣泄式的解脱，反而被留在悲剧后果之中，迫使观众跳出“谁是坏人”的简

① 许晓蕾、邓芷炜：诗人杨克谈《光辉使者》：跳出模板化，看见不一样的精品戏剧，2026-09-07，［2026-09-09］.https://static.nfnews.com/content/202609/07/c12795555.html。

单道德判断，向内开展自我观照。

《光辉使者》构建了思辨式的悲剧审美体系。该剧摒弃圆满救赎、善恶清算的通俗结局，以苍生受难、英雄殉道、主角悔恨的开放留白收尾，放弃标准答案与价值灌输。创作者引导观众跳出浅层情绪宣泄与简单道德评判，主动思考理想限度、善意边界、权力约束、自我自省的深层命题，让悲剧审美从即时的情绪共情，转换为持久的人生反思，拓展了白蛇叙事的思想深度。

四、文化创新：本土传统与外来叙事的创造性整合

1. 吸纳异质资源：西方神性堕落母题的化用

传统《白蛇传》深深植根于明清志怪文学与道教修行文化。原版白素贞的身份为山野精妖，人物的人生走向与价值追求，围绕民间道教“修行渡劫”的母题展开。妖灵行善的主要目的是积累功德，以此打破人妖之间的界限，最终完成身份跃升，求得世俗层面的圆满。善恶报应、天道轮回构成故事运行的底层逻辑，整套人物设定属于带有世俗教化色彩的本土民间文学原型。

《光辉使者》对主要人物原型完成了实质性的跨文化置换，将本土的蛇妖原型替换为西方基督教文化体系中的天使原型，也即“光辉使者”，直接对接西方文学传统中“神性堕落”的叙事母题。该母题源自基督教文化传统，经但丁《神曲》、弥尔顿《失乐园》等经典文本演绎，塑造出原本身负光明使命的天使，因内心骄傲僭越而背离秩序、走向沉沦的叙事范式。张广天脱离了经典叙事中妖灵“积功累德、渡劫飞升”的修行逻辑，将白娄儿与西方天使拉斐尔原型相关联，把女主重新设定为下凡济世的光明使者，拥有先天神性。

同时，该剧又对西方神性堕落母题进行了祛宗教化重构。西方传统天使堕落源于对至高神的反叛，而本剧将神性堕落的诱因改写为善意失度、边界失守、私情异化、理想僭越。白娄儿的沉沦不是神学层面的原罪反叛，而是世俗人性层面的执念失控与认知偏差，从而让西式天使适配中国传统“人为妄作、必遭天谴”的价值体系，实现外来母题的本土化落地与创造性新生。

2. 坚守本土根基：经典记忆留存与外来要素的本土化过滤

在借用外来叙事重构故事内核的同时，该剧并没有完全脱离白蛇传说的文化场域，秉持“本土为体，外来为用”的改编思路作品，保留了国民集体记忆当中的标志性情节：断桥相逢、悬壶行医、端午雄黄现形、洪水漫世等经典桥段悉数得到保留，人间情爱、俗世羁绊、苍生苦难、水患劫难等叙事场景也予以留存。这些广为人知的故事要素，让戏剧始终扎根在中国民间故事的审美语境之中。

与此同时，天使身份、神性使命、神性堕落这些取自外来文化的叙事要素，都经过本土化的过滤重构。创作者剔除创世神学、原罪救赎、天堂地狱等宗教内容，使之服务于人性自省、节制守度、敬畏秩序这一核心主题。外来概念不再是悬浮的表层文化符号，而是服务于本土思想表达的叙事工具。

如何处理本土传统与外来资源的关系，是民间经典当代改编需要面对的重要命题。《光辉使者》提供了一种可行路径：它一方面吸收西方“神性堕落”母题的叙事架构，借其打开关于理想限度、力量边界的思辨空间；另一方面牢牢守住白蛇传说的本土内核，保留经典情节、故事肌理与民族审美，对外来素材完成祛宗教化的改造，避免文化移植带来的生硬错位。这种双向的创造性整合，没有消解白蛇故事固有的本土文化身份，反而借助异质文化视角重新挖掘传统母题潜藏的伦理与

人性命题。该剧为中国传统民间文学实现现代性转译与国际化表达提供了颇具参考价值的改编范式。

结语

民间传说的当代改编，从来不是简单复述旧故事，而是借古老的叙事外壳，介入当下时代的精神议题。白蛇传说历经数百年演变，从志怪警世故事，到田汉版本反抗封建礼教的启蒙叙事，每一次重大改写，都是一代人借经典回应自身所处的现实处境。先锋戏剧《光辉使者》同样处在这一改编脉络当中，但它跳出了以往白蛇叙事习惯的社会批判路径，将悲剧的归因由外部的制度压迫回转到人的内心世界，把思考对象从“环境如何伤害人”转向“有善意与力量的人何以自我沉沦”。

本剧的独特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层面的翻新。更重要的是，它把白蛇这一国民级民间母题，从情爱抗争的固定阐释框架中解放出来，用来探讨一组具有普遍当代性的命题：善意不等于天然正义，崇高理想不能成为越界的借口，强大的力量必须接受自省与边界的约束。白斐儿“善意造恶”的悲剧、戴逸轩所代表的旁观者的纵容、青嫄清醒却无力的悲剧处境，以及瑜罕难对秩序缺憾的辩证理解，共同构成一面镜像，照见理想主义、集体沉默、规则限度等现实社会之中依然存在的精神困境。

为完成这一思想表达，该剧采取了“借壳再造”的改编策略：它保留国民记忆里一系列标志性情节作为文化入口，却置换掉白蛇传统的妖灵修行、情爱反抗的核心母题；吸纳西方“神性堕落”的叙事架构，又剥离其宗教原罪底色，将故事冲突转化为人性执念与秩序边界的博弈。这种处理方式，也为中国民间经典的现代化提供了值得深思的样本。真正的创造性转化，是活用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作为沟通媒介，为传统母题注入面向当下的问题意识。而民间经典的当代价值，亦正在于此：它不必只作为历史的遗存被供奉，更可以转化为观照现代人精神世界的思想资源。让传统经典持续回应现代人的精神困境，这正是创意写作介入传统文化再生产的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

王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王怀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文艺学研究生。